

锦中文画

——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研究

◎ 刘安定 李斌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锦 中 文 画

——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研究

刘安定 李 斌 著

感谢武汉纺织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武汉纺织大学国家项目培育计划、
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Q086）、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省服饰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中文画：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研究/
刘安定，李斌著. —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69-1391-3

I. ①锦…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织物—汉字—
研究—中国—古代②织物—图案—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J5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0397号

责任编辑：竺海娟

封面设计：李 博

锦中文画

——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研究

刘安定 李斌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

邮编：200051 电话：（021）62193056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75 字数378千字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69-1391-3

定 价：98.00元

前言

中国古代织绣染技术及织物相关图案的研究已比较成熟，但针对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前者的研究成果为后者创建研究的范式和提供可观的参考内容，使选题的可行性得到保证。另外，“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这一选题的研究是在中国各级政府、民间组织以及个人积极保护与传承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这一选题既具有热点性又具有盲点性，其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揭示了文字与织造技术、刺绣技术、印染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对织物上文字的影响。从现实意义上看，对于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当代纺织品纹样图案的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素材。

本书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范围的界定。第二、三、四章为织造篇，涉及中国古代的文字锦的分类，将其划分为汉晋时期的铭文锦和唐代以后的文字锦两大类，然后分别对这两类文字锦出现的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第三章为缂丝作品中的文字，主要从缂丝工艺、缂丝文字的分类、缂丝中的印章、影响缂丝文字发展的因素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与研究。第四章为中国古代织款中的文字，涉及织款的概念，以及古代丝织物织款的机头织款和缂丝织款两大类别的界定与分析，着重介绍了两者的功用与形式和特征，阐明了织款的变化与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相关性。第五章为刺绣篇，首先介绍了刺绣工具与材料、刺绣的工艺流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刺绣针法与刺绣文字的关系；其次，对中国古代刺绣作品中的文字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根据古代刺绣的用途，系统地阐述了各个时期书画艺术绣和日常生活绣中文字的特点。第六、七、八章为印染篇，这三章分别从中国传统夹缬、蜡缬、灰缬的工艺入手，分析其中印染文字的特点，并对影响其发展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课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1
一、研究的依据	2
二、研究的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现状	3
一、国外研究现状	3
二、国内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3
一、文献综合研究法	13
二、实地调查法	14
三、比较研究法	14
第四节 研究范围	14
一、时间轴上的界定	14
二、研究内容的界定	14
织造篇	18
第二章 锦中祝福——中国古代文字锦上的文字	18
第一节 文字锦上文字表达的技术基础	18
一、文字锦的显花技术	18
二、文字锦的提花技术	18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字锦上的文字分析	27
一、汉晋时期的铭文锦	27
二、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字锦	30
三、唐代之后的文字锦	33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字锦发展变化的原因分析	34
一、汉晋时期铭文锦出现的原因	34
二、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锦变化的原因	36
三、唐代之后文字锦变化的原因	39
本章小结	39

第三章 丝中艺术——中国古代缂丝作品上的文字	41
第一节 缂丝作品上文字表达的技术基础	41
一、缂丝工艺	41
二、缂织技法	42
第二节 中国古代缂丝作品上的文字分析	47
一、缂丝作品上的文字	47
二、缂丝作品上的印章	54
第三节 影响中国古代缂丝文字发展的因素分析	65
一、缂织技法对缂丝文字的影响	65
二、书画艺术风格对缂丝文字的影响	65
三、帝王对书画某方面的喜好对缂丝文字的影响	66
本章小结	66
第四章 款中标识——中国古代织款中的文字	68
第一节 机头织款	68
一、机头织款源于“物勒工名”	68
二、江南三织造的机头织款延续了“物勒工名”的功用	69
三、晚清民间织物的机头织款具备商标广告功能	70
第二节 缂丝织款	71
一、印章型缂丝织款	72
二、文字名型缂丝织款	72
三、文字名和印章混合型缂丝织款	72
第三节 中国古代丝织物织款的类型分析	73
本章小结	74
刺绣篇	75
第五章 绣中生活——中国古代刺绣作品上的文字	75
第一节 刺绣作品上文字表达的技术基础	75
一、刺绣工具与材料	75
二、刺绣的工艺流程	77
三、刺绣针法与刺绣文字	79
第二节 中国古代刺绣作品上的文字分析	85
一、书画艺术绣上的文字分析	85
二、日常生活绣上的文字分析	95
本章小结	108

印染篇	111
第六章 夹中戏曲——中国古代夹缬作品上的文字	111
第一节 夹缬作品上文字表达的技术基础	111
一、夹缬的工具和材料	111
二、夹缬的工序	112
第二节 中国古代夹缬织物上的文字分析	113
一、唐宋时期夹缬织物上的文字分析	114
二、中国古代蓝夹缬织物上的文字分析	115
第三节 辽代南无释迦牟尼佛夹缬绢的分析	117
一、南无释迦牟尼佛夹缬绢印制方法的分析	118
二、基于南无释迦牟尼佛夹缬绢复原的另一种假想	119
本章小结	120
第七章 蜡中风情——中国古代蜡缬作品上的文字	122
第一节 蜡缬作品上文字表达的技术基础	122
一、蜡缬的工具和材料	122
二、蜡缬工序	124
第二节 中国古代蜡缬作品上的文字分析	125
一、蜡缬技艺在中国的时空转换	125
二、蜡缬在中原地区消失的原因分析	127
三、中原地区蜡缬织物的用途与特征分析	129
本章小结	130
第八章 灰中色彩——中国古代灰缬作品上的文字	131
第一节 灰缬作品上文字表达的技术基础	131
一、准备阶段	131
二、刮浆印染阶段	133
三、后整理阶段	134
第二节 中国古代灰缬织物上的纹样特征	135
一、南通蓝印花布印染工艺与中国传统三大染缬的比较	135
二、南通蓝印花布纹样图案的特征	137
第三节 中国古代灰缬织物上的文字分析	141
一、装饰性文字	141
二、图案中物品上的文字	145
三、主题纹样说明性文字	146
四、书画文字	147
本章小结	151
第九章 结论	152
附录	154
后记	162

第一章 绪 论

文字是人类文明重要的标志之一,曾经出现在众多的载体上,如石碑、龟甲、铜器、羊皮、织物、竹(木)简、纸张等。其中织物作为文字的载体较为特殊,主要体现在功能上。一类是作为记录知识的工具,如在缣帛(一种丝织物)上书写文字;另一类是采用织、绣、染等工艺在织物上表达出文字,这时文字记录知识的功能性减弱,虽然也表达出一定的含义,但从整体上看更侧重于点缀的功效。本书讨论的正是这部分与古代织造、刺绣及印染技术密切相关的文字。这些文字在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的变化趋势不仅反映了历史上风俗习惯、社会心理、艺术风格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当时的织造、刺绣、印染技术的发展水平。

第一节 课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通过对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图案与织染绣工艺之间的关系”这一专题的概括、总结与创新。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是本书立论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古代织物上的纹样图案与工艺、经济、文化等之间联系的研究,早已有学者涉足。通过对相关研究专著以及笔者的实地调查研究,证明本选题是热点中的盲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研究的依据

研究的依据包括课题研究的模板和素材。一方面,大量织物纹样图案相关的著作为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图案研究提供了纹样图案方面研究的范式;另一方面,大量带有文字图案的中国古代织物为本选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支撑。

1. 相关研究著作为本选题提供了众多研究模板

在“中国古代织物纹样图案研究”相关的著作中,有黄能馥、陈娟娟著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赵丰主编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和《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潘鲁生编著的《中国传统艺术·汉字装饰》等。虽然这些著作中汉字纹样图案不是很多,但却为本书提供了汉字图案方面研究的模板。此外,钱小萍的《中国宋锦》、黄修忠的《蜀锦》、[清]丁佩的《绣谱》、[清]沈寿的《雪宦绣谱》、孙佩兰的《吴地苏绣》、薛亚峰主编的《顾绣》、冯泽民编著的《荆楚汉绣》、郑巨欣的《中国传统纺织品印花研究》和《浙南夹纈》、吴元新的《刮浆印染之魂:中国蓝印花布》等,不仅提供了纹样图案方面研究的范式,也提供了工艺研究方面的方法。当然还有一些纺织通史类专著,如陈维稷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赵丰主编的《丝绸通史》

等,都为本选题提供了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图案及其技术研究方面的模板。以上众多学者的研究为本选题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范式,本书借鉴这些成果来总结、归纳出适合本选题的研究方法,并进行一些改进和创新,即从织、绣、染工艺与织物上文字图案的相互联系出发,找到其内在的联系,进而对绣、织、染织物上的文字进行分类、分期讨论,并且深入探讨造成其文字图案变化的诸多因素。

2. 大量带有文字图案的中国古代织物为本选题提供了素材支撑

中国七千年的纺织艺术史提供了大量带有文字图案的织绣染作品。在织造方面,最为著名的是汉代出现的文字锦,笔者初步统计,仅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汉代文字锦种类就达52种之多,可见文字锦的研究素材相当丰富。到了宋代,融织造、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的缂丝艺术又成为织造文字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出现过举世闻名的缂丝大师朱克柔、沈子蕃等。在刺绣方面,文字也经常出现在古代织物上,特别是明代以来,随着书画绣的兴起,出现了大量带有文字图案的刺绣精品,如韩希孟、顾兰玉、丁佩、沈寿都是书画绣方面的大师,她们也都留有非常优秀的书画绣作品。自宋代以来,书、画、印、绣逐渐融合,因此,几乎每件优秀的书画绣品中都会有文字的身影。在印染方面,最早出现印染文字的历史记录出现于宋代嘉定年间(1208—1224年),虽然传世的印染织物上有文字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但我们根据晚清、民国初期的一些文物,可以认定印染文字在民间也是相当普遍的。因此,若以带有文字或相关图案的中国古代织物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现存的可供参考的研究素材比较丰富。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织绣染技术及织物相关图案的研究比较成熟,而针对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相对薄弱,使得本课题可以通过借鉴前者的研究成果为后者创建研究的范式和提供可观的参考内容,使选题的可行性得到保证。另外,“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这一选题的研究是在中国积极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既具热点性又具盲点性,其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研究的意义

根据纺织品考古发现,最早带有文字及其图案的织物出现在西汉末年。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纺织机械转型的关键时期,汉代的经线显花技术所织出的图案纹样具有抽象、夸张、写意的风格,在图案纹样中加织文字能更好地加深对图案的理解。到了唐代开始采用纬线显花技术,同时织具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了花楼织机,图案出现的形式更趋简洁,文字转向具有特定含义的字句,并且越来越艺术化。印染和刺绣织物上的文字也呈现出类似的一些规律。所以,通过对古代织物上文字的研究,可以揭示文字与织造技术、印染技术、刺绣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对织物上文字的影响。从现实意义上看,对于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图案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当代纺织品纹样图案的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素材。

第二节 研究现状

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其图案”均没有专题性的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织物上的图案的研究较多,但针对织物上的文字或围绕两者间的联系而衍生的一系列的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从全面、整体的视角出发开展的相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其图案”并没有专题研究。关于纺织品考古方面,20世纪初,新疆丝绸之路沿途古城遗址、古墓的发掘和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吸引了大批外国探险人员,其中有英国的斯坦因(1862—1943年)、法国的伯希和(1878—1945年)、俄国的奥登堡(1863—1934年)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1876—1948年)探险队等。他们在新疆地区抢夺了大量汉唐时期的织物文物,其中就包括许多汉代铭文锦,而在甘肃敦煌他们又获得了唐宋时期的织物文物。这样,国外探险队获得的古代织物正好是组成一个从汉代到宋代的中国古代织物序列。这些中国古代织物现已分散于英国、印度、法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以及法国的吉美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纺织品,其中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刺绣《佛说斋法清净经》,可以说是刺绣与书法的完美结合。该博物馆还收藏了《蓝地朵花卍字锦》,其上织有佛教卍字,也是一件带有文字的丝织品。除此之外,日本正仓院保存着大量敦煌纺织品鼎盛时期的遗存,其中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经帙^[1]。总的来看,国外学者主要是针对从新疆和甘肃获取的纺织品文物进行研究,出版或发表过一些与中国古代纺织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如:斯坦因的“Sand-Buried Bruins of Khotan”^[2]、“Central Asia Relics of China's Ancient Silk Trade”^[3]等;安德鲁斯的“Ancient Chinese Figured Silks Excavated by Sir Aurel Stein at Various Sites of Central Asia”^[4]。近年来,如阿曼达·沃德和卫怡真等都发表过论文,对斯坦因的纺织品文物进行研究^[5],……。然而,国外学者对于文字与纺织方面的研究却是零碎和分散的。

再从一些国外纺织史的专著来看,如Ange Geijer在“A History of Textile Art”一书中有关中国汉代的纺织艺术,其中有对铭文锦少量的论述^[6]。Vijaya Ramaswamy在其“Textile and Weavers in Medieval South India”著作中,虽然没有提及中国的文字锦,但提到了印度的文字锦^[7],可以用来与中国的铭文锦进行比较研究。Stuart Robinson的“A History of Printed Textiles”^[8]中虽然没有提及中国古代的印染,但介绍了印度的印染技术,也可以将其与中国的印染技术进行对比研究。Eric Broudy编著的“The Book of Looms: A History of the Handloo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9],对于从国际化的视角研究古代纺织机械的原理和型制非常有帮助,作者从世界纺织史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世界各地的纺织机械,在第七章“The Drawloom”中采用对比的观点比较了中国的提花织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提花织机在原理和操作上的不同,可以说这一章是以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织机的认识。另外,还有李约瑟主编,Dieter Kuhn负责编著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Textile Technology: Spinning and Reeling”,其中对中国的纺纱技术史进

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从这些著作中可以了解西方人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研究的新视角。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就其形成工艺可大致分为三大类：织造类、刺绣类以及印染类文字。织造类文字是指通过织造机械在织造过程中生成的文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织物主题纹样的文字，相关的织物有文字锦和书画缂丝作品，如汉锦中的韩仁绣锦、乐字锦、寿字锦以及宋代的书画缂丝作品等；另一类是织款中的文字，织款又可分为机头织款和缂丝织款，机头织款一般反映织物的年代、作坊名甚至织者，如明清时期江南三大织造的织款和缂丝织款中的印章织款和落款。刺绣类和印染类文字顾名思义就是采用刺绣工艺和印染工艺在织物形成以后加工上的文字。因此，对中国古代织物上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在国内文献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1）织造类文字与织造技术的研究；（2）刺绣类文字与刺绣技术的研究；（3）印染类文字与印染技术的研究。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一些鉴藏印章式的文字。

1. 织造类文字与织造技术的研究

（1）织造类文字及其相关图案的研究

织造类文字曾大量出现在汉代及以后的织锦中，本书将织有文字纹样图案的织锦统称为文字锦。文字锦最早是由斯坦因于 1913 年在新疆楼兰古城遗址中发现的，贝格曼于 1931 年在新疆也发现了一批文字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 世纪 50 至 90 年代，国内的考古学者也陆续在楼兰古城、尼雅遗址、营盘墓地和扎滚鲁克墓地等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文字锦。笔者根据相关的考古文献将这些文字锦发现的时间、地点、考古单位或人员以及文字锦的名称作了一个简要的列表（表 1-1）。

表 1-1 文字锦的发现情况说明^[10]

序号	年份	考古单位或人员	地点	出土文字锦名称
1	1913	斯坦因	楼兰古城附近地区	（1）“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极”锦； （2）“延年益寿”锦；（3）“乐”字锦； （4）“登高明望四海”锦；（5）“永”字锦；（6）“长乐明光”锦；（7）“续世”锦；（8）“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
2	1931	F·贝格曼	罗布泊地区	（1）“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极”锦； （2）“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
3	195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	尼雅遗址	（1）“万世如意”锦；（2）“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3）“阳”字锦

4	1980	新疆楼兰考古队	楼兰地区	(1)“长寿明光”锦;(2)“望四海 富贵寿为国庆”锦;(3)“登高贵富” 锦;(4)“广山”锦;(5)“延年益 寿大宜子孙”锦;(6)“延年益寿 长葆子孙”锦;(7)“永昌”锦;(8) “泽”字锦;(9)“长乐明光”锦;(10) “续世”锦;(11)“孙”字马纹锦; (12)“年”字禽兽纹锦;(13)“万” 字禽兽纹锦
5	198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	山普拉墓地	(1)“子孙”锦;(2)“宜吉”锦;(3) 其他明显织出汉字的几何纹锦
6	1995	中日/日中尼雅遗址 联合学术考察队	民丰县尼雅 遗址墓葬	(1)“王侯和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 (2)“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3) “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4)“安 乐如意长寿无极”锦;(5)“登高 明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6)“世 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7)“安 乐绣文大宜子孙”锦;(8)“千秋 万岁宜子孙”锦;(9)“金池凤”锦; (10)“讨南羌”锦;(11)“长乐明 光”锦;(12)“受右”锦;(13)“广 山”锦;(14)“韩侃吴牢锦右二(亲)” 锦;(15)“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 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锦;(16) “德宜子生”锦帽
7	1995、199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尉犁县营盘 墓地	(1)“登高”锦;(2)“寿”锦;(3) “王”锦
8	199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等	且末扎滚鲁 克墓地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
9	199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雅遗址墓葬	“大明光受右承福”锦
10	1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新疆队	加瓦艾日克 墓地	“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
11	1998		尼雅遗址	“元和元年”锦

丝绸之路沿途墓葬内发现的汉晋时期的文字锦大多带有固定格式的铭文,如“宜子孙”“佑子孙无极”“长乐”等,有些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但文字内容十分特殊,文字表意的功能较突出。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它们曾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过,因此,为了将它们与唐代及其之后更加强调装饰功用的文字锦区别开,笔者认为,这个时期出土的文字锦统一命名为铭文锦似乎更加合理。纺织史学界普遍认为,铭文锦是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织锦,它继承了西汉时期汉锦经线显花的纹样图案特征,以避邪的奇禽怪兽、变异的云纹花卉为铺设,吉祥的汉隶铭文穿插其中,从右向左排列,通常以铭文为主题^[11]。根据对目前出土的汉代铭文锦的考察,其中文字有“永昌”、“万年益寿”“万世如意”“长生无极”“长乐明光”“登高明望四海”“长生无极益寿大宜子孙”“富且昌宜王侯天延命长”等^[12]。对汉代铭文锦的织物组织结构进行分析的学者有希尔凡、夏鼐^[13]、武敏^[14]等,他们的研究为本课题中铭文锦部分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个案分析。

①汉晋时期的铭文锦

汉晋时期的铭文锦在丝绸之路沿途的墓葬中时有出土,有些观点认为,这批锦属于秦汉时期的织物^[15]。然而,笔者通过对陈维稷(1902—1984年)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黄能馥(1927—)和陈娟娟(1936—2003年)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赵丰(1961—)的《丝绸通史》、罗瑞林和刘柏茂的《中国丝绸史话》^[16]等相关部分资料的分析,并对墓葬主人的身份以及锦文内容的考证,同时结合历史史实,判断汉代铭文锦出现的年代应为西汉(前206—25年)末年至魏晋时期(220—420年)。虽然魏晋时期已经超出了汉代的历史范畴,但这一时期的铭文锦与汉代的铭文锦在织造工艺和纹样图案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笔者将魏晋时期的铭文锦也划归汉晋时期的铭文锦之中。通过研究发现,西汉时期的普通织锦纹样图案已经非常丰富,动物纹样(龙、虎、辟邪、獬豸、麒麟、鹿、雁等)活跃于具有动荡、紧凑感的几何纹样和云气山脉纹样之中,显现出图案纹样的动态之美^[17]。从西汉末年开,这种纹样图案的间隙被加织进大量表达不同含义的文字,从而诞生了汉代的铭文锦。赵丰在其《中国丝绸通史》中将铭文锦上的铭文分成三类:一是祈祷延寿、子孙蕃昌的吉祥语;二是铭文虽然不长,也各有所指,但较为含蓄;三是铭文较长,有些可能表达了特殊的含义^[18]。于志勇在其《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一文中,则将铭文分为一般吉祥语、政治术语、弘扬儒教教化及社会文化价值等意识形态理念的文字。

②汉晋时期之后的文字锦

汉晋时期之后的文字锦与汉晋时期的铭文锦相比,更强调装饰作用。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字锦已经大量使用到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汉字同时具有文字表义和图案装饰的双重功能,甚至更趋向于后者。因此,汉晋时期之后的这种锦称作文字锦更为合适。首先,汉晋时期之后的文字锦中的图案更加丰富和形象,逐渐突破了汉锦图案纹样的抽象、象征的表现手法。文字越来越短,不再出现类似汉代铭文锦中的长句文字,文字的辅助表义功能越来越弱。如1964年新疆阿斯塔那18号唐绍伯墓出土的胡王牵驼对狮纹锦,1966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北区48号墓出土的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两片锦中的图案纹样生动逼真,“胡王”和“贵”字嵌织在图案纹样的间隙处。

文字的装饰性增强,文字与图案融合在一起成为主题纹样的一部分。如唐代的龟背王

字纹锦,汉字“王”字与龟背构图十分巧妙,图案乍一看似乎稍显简易,实则寓意深远。在唐代,龟属于一种瑞兽,以长寿的特性而为人们所喜爱。龟背与王字结合,真可谓雅俗共赏、情趣盎然,表达了人们祈寿和当上领袖的心理愿望。元明清时期是汉字装饰发展的鼎盛时期。苏州大学的一篇硕士毕业论文《论纺织品图案中的汉字装饰》中分别简要地论述了织锦中的寿、喜、福、禄、贵、丰、卍等文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而对于织锦中某个特殊的文字,学界也有些人已经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如辛维金对服饰中的卍字纹样进行了简要评述,但研究深度尚不够^[20];陈娟娟则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对织锦中的寿字纹进行了研究^[21]。

③机头织款和缂丝书画

除了文字锦外,机头织款和缂丝书画中也有织造类文字。机头织款最初具有“物勒工名”的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机头织款出现于明代,到了晚清时期,机头织款逐渐延展出类似于商标和广告功能。江南三大织造的机头织款实物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丝绸博物馆,东华大学纺织服饰博物馆中也收藏了大量的民间机头织款。除实物外,有些书籍上也能找到一些关于织款的图片记载,朱同芳主编的《中华瑰宝:南京云锦》一书中有大量各种各样精美的机头织款^[22],王宝林编著的《云锦》一书中也有5幅机头织款^[23]。中国缂丝书画的精品主要收藏于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博物馆。

(2) 织造技术的研究

中国古代织造技术的研究是纺织科技史研究的核心部分,古代就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如元代王祯的《农书》^[24]及薛景石的《梓人遗制图说》^[25],其中就有关于织机制造的说明,并附有设计图。类似的古籍还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26]等。这些古代著作是我们研究古代纺织工艺技术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当代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古代织造技术做过系统的论述,如陈维稷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周启澄的《纺织科技史导论》^[27]、张春辉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各种织机构造和工作原理^[28]。胡维佳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中的纺织条,对丝织的原料、纺纱、织造、染色等工艺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29],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织机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相关的著作以外,中国数字化期刊网上也有大量关于古代织机和织造技术方面的论文,如《建国以来我国古代纺织机具的发现与研究》^[30]《卧机的类型与传播》^[31]《中国云南古代纺织机械发展史初探》^[32]《踏板机构在古代纺织机械中的运用》^[33]《古代多综多踞机省踞机构原理分析》^[34]《古代多综多踞提花织机结构及装造形式探讨》^[35]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织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这些论文并没有涉及文字图案,更谈不上将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与织造机械、织造工艺联系起来研究,因此,这也是本课题将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各类织机的实物在纺织类、民族类博物馆或研究所中均有收藏,如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上海纺织博物馆、上海七宝棉纺织馆、黄道婆墓、黄母祠、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博物馆、海南民俗博物馆、五指山黎锦研究所、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等等,这些织机都为本书提供了织造技术方面的实物资料,进而将文献资料、织机实物与织造文字进行系统的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与

外在关系。

2. 刺绣类文字与刺绣技术的研究

通常, 刺绣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指工艺本身, 即用针和线在织物上绣制各种装饰图案; 二是指采用这种工艺制得的装饰图案。

(1) 刺绣类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

刺绣文字早在三国时期已有记载, 据前秦(351—394年)学者王嘉(?—390年)的《拾遗记》卷八记载, 三国时期吴国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36]。唐永贞元年(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 因刺绣闻名。由此可知, 刺绣文字在中国很早就已经运用了。目前纺织史学界还没有专门针对刺绣文字的研究, 但在相关的纹样图案中我们能发现一些文字图案。如易锐、易凯编著的《中国刺绣织物图案与配色》^[37]中收录的刺绣主要为民间图案, 题材以花卉、鸟类为主, 人物为辅, 色泽鲜明, 对比强烈, 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积淀。徐咏菊的《刺绣图案大全》^[38]、《实用刺绣图案》^[39], 则从台布窗帘、床枕椅垫、服装鞋帽、围裙手帕等方面的刺绣图案展开, 更多地在图案上求新求变, 因此, 传统图案相对较少。蓝先琳、李友友合著的《中国传统刺绣》^[40]是一部中国传统刺绣纹样的图册, 从服饰绣品、日用绣品两个方面搜罗了大量的刺绣纹样图案, 服饰绣品包括衣裳、坎肩、云肩、围腰、兜肚、鞋袜、冠帽; 日用绣品包括枕头、幔帐、背扇、荷包、挂件、画屏、绣片。可谓纹样图案丰富, 其中有很多纹样图案中有大量的文字图案, 这些图案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刺绣织物上的文字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不足之处在于, 作者对这些图案的描述过于简单。此外, 王光普、张燕编著的《母亲的针和线: 刺绣与香包》^[41]是一部专门论述刺绣与香包的专著, 并且都是民间纹样图案, 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大量带有文字的刺绣作品。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民间刺绣图案方面的著作, 如《民间刺绣图形》^[42]《刺绣图案集》^[43]《中国的刺绣》^[44]《刺绣图集》^[45]等, 这些都可作为本课题的参考资料。

此外, 西安美术学院李喆的硕士学位论文《刺绣与当代绘画的结合创新》^[46]中有大量刺绣文字的图案。该论文首先从中国刺绣的由来及起源展开, 探讨了苏绣、粤绣、蜀绣、湘绣的联系与区别。然后将笔锋转到与绘画结合较紧的苏绣, 从苏绣的历史起源、工艺特色、分类以及制作过程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接着论述了刺绣中的绘画特点及运用; 最后对苏绣与当代艺术绘画进行了思考。笔者认为, 这篇硕士学位论文所收集的大量书画刺绣作品及其工艺的研究可以为本课题提供研究素材和理论参考。

中国数字化期刊网上也有大量关于刺绣图案研究的论文, 大多是研究少数民族刺绣或地方刺绣的。如《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47]《刺绣图案中直线和圆弧的矢量化研究》^[48]《对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造型语言的审美分析》^[49]《贵州苗族原生形态刺绣图案的艺术特征》^[50]《河南民间刺绣图案的吉祥如意研究》^[51]《论民间美术的造型特点——以土族刺绣图案为例》^[52]《蒙古族刺绣图案纹样的色彩研究》^[53]《浅谈瑶族刺绣图案中的宗教色彩》^[54]《羌族刺绣图案题材及民族文化内涵分析》^[55]等, 这些论文都是探讨刺绣图案的, 为本研究提供了刺绣文字的相关线索。

(2) 刺绣工艺的研究

刺绣工艺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在古代称“黹”（音 zhǐ）“针黹”。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56]。简言之，刺绣工艺就是用针和线把人们的图案设计添加在织物上的一种艺术。据《尚书》中“衣画而裳绣”的记载推测，刺绣的历史在我国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57]。刺绣按材料可分为四类：第一，用线刺绣，最基本的是用彩色线刺绣，如白色线、黑色线、金色线、银色线绣及抽绣等；第二，用特殊材料固定刺绣，有缎带刺绣、串珠绣、金银饰刺绣、绳状刺绣等；第三，在特殊的织物与材料上刺绣，如在网状织物、编织物或皮革上刺绣；第四，在底布上用其他色布装饰花样，有贴花、补缀绣等^[58]。刺绣按地域又可分为苏绣、蜀绣、粤绣、湘绣、鲁绣、汴绣、京绣、瓯绣等，其中以苏绣、蜀绣、粤绣、湘绣最为出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从绣品遗物角度对其风格进行分析，西周时期（前 1046—前 771 年）和春秋时期（前 770—前 476 年）的绣品形象造型相对简单，制作也比较粗糙。到了战国时期（前 475—前 221 年）就渐趋精美，善于运用“锁绣”，也就是辫子绣。这一时期的对凤对龙纹绣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在手法上写实与抽象并用，穿插番叠，形象细长清晰，并运用留白技法，清晰地体现出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重要特征。到了汉代，刺绣工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汉墓曾出土绢绣残片，绣的针法有辫绣、打籽绣。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铺绒绣，可以看出当时的锁绣工艺已经相当精细。

唐代刺绣在针法方面除了运用锁绣外，还采用了平绣、打点绣、纁衲绣等多种针法。其中纁衲绣最为独特，又称退晕绣，即现代所称的戗针绣，它可以表现出深浅变化不同的色阶，使描写的对象色彩富丽堂皇，具有浓厚的装饰效果。南宋刺绣工艺多以名人书画为粉本，其艺术价值极高。在针法上有齐针、接针、戗针、辫绣、鸡毛针等。宋代可谓中国刺绣发展的高峰期，明代屠隆（1543—1605 年）著《考盘余事》卷二《宋绣画》中载有：“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之态。佳者较画更胜之，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59]。明代嘉靖年间在上海崛起的露香园顾绣，对苏绣欣赏品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顾绣所作的山水、花鸟、佛像、书法等等继承了宋代画绣的传统，在绣品配色、针法运用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其中以韩希孟的刺绣作品最为杰出。她的主要作品有仿宋、元各集册，所用针法丰富、整齐，形象生动、逼真，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60]。到了清代，中国刺绣工艺在各地发展为不同的体系，如苏绣、蜀绣、粤绣、湘绣、鲁绣、汴绣、京绣、瓯绣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61]。

对于刺绣技术的研究，道光年间，苏州女子丁佩首次总结刺绣技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刺绣专业著作《绣谱》^[62]。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创造了“仿真绣”，晚年口述《雪宦绣谱》，总结刺绣经验^[63]。目前，关于刺绣技术的专著有《刺绣针法大全》^[64]《经典刺绣针法与花样：精选款》^[65]。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和论文认为，路甬祥主编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第九章《刺绣技术及制作工艺》^[66]对各种针法介绍得相当详细，并对各种针法以图形的方式进行描述。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绣的专著中对各自的刺绣工艺进行了一些总结，如《吴地苏绣》^[67]《顾绣》^[68]《湘绣技法》^[69]《中国蜀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70]《荆楚汉绣》^[71]等。

3. 印染类文字与印染技术的研究

（1）印染类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

印染类织物按照传统工艺的特点可分为夹缬类、蜡缬类、绞缬类、灰缬类四大类。

关于夹缬织物上印染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根据纺织品考古发现，目前最早带有文字的夹缬实物于1974年发现于山西应县佛宫木塔中，共有相同的三幅南无释迦牟尼佛，画幅接近正方形，高65.8厘米，宽62厘米，佛陀两手扶膝端坐于莲台，披红色衣，头部有光圈，顶部有装饰宝相花的华盖，最为奇特之处是在其边缘处印“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字左反而右正，说明是将绢双叠印染的^[72]。然而，夹缬在宋代受禁之后，逐渐从复色趋向单色^[73]，再也无法见到色彩华丽的彩色夹缬织物。郑巨欣曾对中国唐代和辽代的多件夹缬标本进行过复原，其中就包括这件辽代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夹缬绢》^[74]。

目前谈到夹缬其实指的就是浙南地区的蓝夹缬，全中国只有浙南地区才传承着这一传统的印染技艺。对于夹缬图案的研究比较多，几乎每部论述夹缬的专著或论文都会对夹缬的图案进行讨论，讨论的焦点也多集中在版式、题材、内容等几个方面。例如张琴的《蓝花布上的昆曲》就是一部对蓝夹缬图案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她认为蓝夹缬纹样与昆曲有着密切的联系，蓝夹缬是传统染织品中以戏曲人物为主的唯一孤例^[75]。当然，在这部著作中也有些带有文字图案的蓝夹缬作品，值得我们参考和研究。

整体来看，对于夹缬织物上出现的文字及相关图案的直接研究并不多。我们进一步搜集现存的蓝夹缬藏品中的文字纹样，发现“囍”纹样较多。苏州大学朱蕾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夹缬图案研究》中指出，这种带有“囍”字样的夹缬最初仅用于嫁妆^[76]。笔者认为，从夹缬织物的功能上看，带有“囍”字样的织物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字样是很有道理的。“囍”字体对称，且“喜”字本身表义喜庆吉祥，又能表达人们求子求孙、期盼子女成龙成凤的愿望。因此“囍”字纹样能成为一种经典的传统纹样延续至今。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工农兵夹被，这种纹样明显带有“文革”时期的特征，但也采用了传统的“囍”字纹样，说明这种“囍”字纹样顽强的生命力。对夹缬织物上文字的研究，笔者认为目前还需要更进一步对纹样进行收集和整理，以期能对文字进行更细化的分类和总结。

关于蜡缬织物上印染文字及其图案的研究。马正荣的《蜡染纹样选》收集了包括丹寨苗族纹样、黄平重安江和安顺苗族蜡染纹样，还有黔东南、黔西南苗族纹样。蜡染的纹样一般包括飞鸟、鱼虫、花卉等，形式多种多样，丰富生动。然而，在这些纹样中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文字的踪影。此外，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著的《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蜡染》以及贺琛、杨文斌、赵丰编著的《贵州蜡染》不仅描述了贵州蜡染的制作工艺，而且对其纹样图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样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文字纹样的图案。这种情况让人有一些诧异，蜡染工艺完全有能力印制出带有文字图案的织物，但在传统纹样中却没有出现文字。中国数字化期刊网中的相关论文也这样，大多是对图案纹样进行文化底蕴和构图艺术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也没有发现任何带有文字符号的纹样图案。不过，笔者在云南旅游时，有幸发现一件带有“囍”字的蜡染作品（老鼠娶亲蜡染），在老鼠迎亲的队伍中有一对老鼠手持“囍”字灯笼。显然，这件作品属于当代蜡染的范畴。笔者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传统蜡染中为何几乎没有出现带有文字的织物？是否存在着文化上的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的资料发掘和实地调查。

由于古代绞缬织物上并没有发现文字，并且从工艺的角度来看，绞缬也很难实现文字